

學術集刊發展取向淺議

——以《海洋史研究》為例

李慶新

[提要] 學術刊物向專業化發展是當今國際學術的一個潮流。無論集刊還是一般刊物，其共同目標都指向發表高水平的學術成果，追求高品位學術境界；有所不同的是，一般刊物以綜合見長，集刊則以專精取勝。因而集刊欲在學術期刊中佔據不可取代的一席之地，就應該揚長避短，立足專業，將專業優勢轉化為集刊優勢，在優長領域做特做強，佔領學術高端位置，引領學術潮流，為學術創新、學科建設、學術流派發展多作貢獻。集刊不懼“曲高和寡”而最忌平庸趨俗，集刊人應該擁有“素心人”情懷，用心凝聚志同道合的研究團隊與學者共同體之智慧，向學術界貢獻純粹精湛的學術成果。當前集刊面臨諸多困境，應該創造合適的條件與資源支持，使優秀集刊在上檔次、國際化等方面獲得更大的上升空間，形成具有國際前沿水平、掌握學術話語權和規模效應的名優集刊群。同時集刊本身也須行內自律，加強編輯出版的科學化、規範化、制度化建設，實施“進入—退出”機制，優勝劣汰，確保集刊在規範軌道上向專業高端發展。

[關鍵詞] 學術集刊 專業優勢 學術定位 發展取向

[中圖分類號] G237.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3)04-0119-09

近現代中外學術史表明，有實力與影響力的學術機構、學術流派或學術群體，往往擁有一份出色的學術刊物，作為踐行理念、展示成果、對外交流的園地；而有影響的學術刊物，在學術史上往往扮演著引領潮流、推進學術創新的重要角色。

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科學發展，既豐富了人類對社會的認識，又對傳統的人文學科提出挑戰，舊學科畛域被打破，新興學科紛紛興起。新史學的一個趨向，就是打破史學研究的專業局限和學科局限，從以往注重政治史，轉而關注經濟、社會歷史。英國、法國、德國、美國等國大學先後開設經濟史課程，推動經濟史學、社會史學等新學科的成長，與此同時，各國經濟史學者陸續創辦了多種專業刊物，對歐洲各國經濟史、社會史學發展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1893年，維也納經濟史學者創辦了《社會經濟史季刊》（*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1926年，艾倫·鮑爾（Eileen）、托尼（R. H. Power）、李普森（E. Lipson）在牛津大學成立“經濟史學會”（Economic History Society），出版《經濟史評論》（*Economic History Review*），標誌著經濟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1929年，呂西安·費弗爾和馬克·布洛赫創辦《經濟與社會史年鑑》（*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一反傳統史學只重視政治、軍事、外交的傾向，而以經濟史、社會史研究為重，標誌著年鑑學派的成立，影響了一代學風。

受歐風美雨洗禮，上世紀20、30年代，中國學人創辦了《學衡》、《禹貢》、《食貨》等一批優秀學術刊物，凝聚學界同人，增進新學術成長，形成有重要影響的學衡派，創建歷史地理學、經濟史學等新興學科。民國“四大學術名刊”（《國學季刊》、《清華學報》、《燕京學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對新史學、考古學、語言學等學科發展的巨大作用與深遠影響，更是眾所周知，至今仍可感受到其不朽價值與影響力。70年代末以來，國內改革開放，撥亂反正，學術不斷進步，一批頗有影響力的學術刊物應運而生，如歷史學領域的《唐研究》、《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等，都堪稱其中之佼佼者。

上世紀60年代，歐美歷史學出現一個新的學科方向。1960年，“國際海洋史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Maritime History）成立，這個國際組織以歐洲和美國海洋史專家為主，包括有20多個國家的歷史工作者，促進各國海洋史方面的交流、合作、分享研究成果，主要研究海洋探索、海軍戰史、海洋經濟（包括造船、海上貿易、海上捕撈）等。由於範圍太窄，對海洋社會與文化方面的缺乏關注，海洋史研究乏善可陳，一度出現受冷落和被邊緣化趨勢。90年代，歐美海洋史學開始注重社會與文化生活。例如研究港口發展史對全球化的影響，海洋生態史對全球生態史的影響，海洋氣候的變化對全球變暖的影響，海洋捕撈對全球生態的影響等，這一新趨勢既給海洋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也開闢了新的研究領域，被稱為“新的海洋史”。2008年，美國歷史學界最大的學會——美國歷史學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首次承認海洋研究史是歷史研究的一個專門學科，跟其他專門史的歷史學會一樣，可以組織專門的學術討論會，參加一年一度的美國歷史研究的年會，海洋史研究成為一門專門史，首次被歷史學界承認。目前，歐美從事海洋史研究的國家主要有美國、荷蘭、瑞典、英國、德國、澳大利亞、加拿大。他們都擁有自己的學術組織、學術刊物、學術年會，比較有名的刊物是英國的海洋研究所出版的《海員的鏡子》（*Mariner's Mirror*）與《海洋史國際刊物》（*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time History*），由國際海洋史經濟學會出版。^①

東亞的日本對海洋史研究相當重視，處在國際海洋史學前列。90年代以來，日本海洋史研究從以日本海洋史與東西交涉史為重心的日中交通史、南島史、南洋華僑史研究等傳統領域，轉而以東亞海域史研究為中心，探索海域內部及海域之間的交流，以及民族、區域的比較研究，對亞洲海洋史研究貢獻頗多。例如濱下武志教授以“海域融合”觀念闡釋近代亞洲歷史，把亞洲作為一個區域和整體來把握，關注海域內網絡模式（如中介地研究、朝貢體系和華人網絡等）、港口之間的模式、海域之間的模式（如跨海商人集團、跨海城市關係、跨海經貿往來、跨海貨幣流通、跨海移民和勞務等問題）、海洋管理及利用模式（如沿海宗教信仰、民間與官方衝突與利用問題等）、腹地模式等方面的研究，建構以朝貢貿易為核心的具有“亞洲價值”、“亞洲模式”的近代亞洲經濟圈，展示了東亞海洋史研究在理論與範式上的新建構，在國際海洋史學擁有不可忽視地位。^②

中國是個海陸兼備的古老國家，無論歷史、現實到未來，海洋都是中國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海洋史研究在上世紀初已經出現，在中西交通史、經濟史、華僑華人史以及歷史地理等領域，已經出現不少“涉海”研究成果。1978年，中國海交史研究會與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聯合主辦《海交史研究》，數十年來刊發大批專業文章，大體上反映了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的總體水平。台北中研院人文社科研究中心（原三民主義研究所）海洋史專題研究中心自1983年以來每隔兩年舉辦一屆國際性海洋史學術研討會，匯集不少高水平力作，目前出版了11部論文專輯。2009年舉辦第11屆“中國海洋發展史研討會”，其成果以連續專刊“海洋史研究叢刊”公開出版。廈門大學為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重鎮，在海洋史研究上也“開風氣之先”，楊國楨先生主編的《中國社會經濟史》一直注重發表相關成果。

然而，毋需諱言，中國海洋史研究乃至整個海洋人文社科問題研究，總體水平仍不及美歐、日本等國，從學科建設上也沒有得到學界應有的足夠重視。迄今為止，國內高校、研究機構尚未建立起獨立的海洋史專業研究機構，也沒有組織起全國性專業研究組織，海洋史學科體系建設有待學界進一步努力。東京法政大學早在1978年就編寫出一本《南海史》通信教育教材，但對南海擁有主權的中國，迄今未見一部完備的《南海史》。當下東海、南海島嶼海權糾紛升級，加強海洋問題研究具有十分迫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確實如馮爾康先生所指：“大力開展海洋史研究，此其時也！”^①因應國際學術潮流及國家海洋事業發展需要，2009年6月，廣東省社會科學院以歷史研究所為依託，成立了國內第一個海洋史研究機構——廣東海洋史研究中心（下稱中心），以華南沿海與南海海域歷史研究為中心，以世界視野，構建一個具有區域特色、國際水平的海洋史研究基地和交流平臺，為中國海洋史學建設盡一份力量。

鑒於國內仍無一本具有明確學科定位的專業刊物，中心建立之初，即決定創辦專業刊物《海洋史研究》（下稱本刊），每年出版一輯，作為中心展示研究成果和對外交流的學術載體。這一計劃獲得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支持，並得到國內外同行的積極回應。2010年3月，本刊創刊號順利面世。

二

中心把專業研究與編輯出版工作相結合，因而《海洋史研究》編輯工作成為中心主體功能的一部分。科研人員既是專業工作者，又是本刊編輯人員，主辦《海洋史研究》是全新的嘗試與挑戰。

主辦一份學術集刊，需要解決從人力、物力、財力到編輯、出版等一系列問題，需要面對許許多多繁瑣的事務，其中關鍵環節莫過於稿源。它關係到集刊文章的質量，進而制約著集刊的整體水平，質量可靠的稿源可保集刊的高水平並可持之以久。在國內現行報刊管理體制下，相對於時下一般學術刊物，嚴格來說，集刊屬於“不規範”的“書刊”——非書非刊，即通常所謂的“以書代刊”。集刊以這種形式出版實屬不得已，原因並不複雜，毋需多言。一般而言，因集刊不能納入國內各類“權威期刊”、“核心期刊”、“引文索引期刊”體系，因而很難進入高校、研究機構的科研管理、考核與評價體系，從科研績效、工作計分，到職稱評定，集刊都受到另眼相待，低人一等。近年國內湧現越來越多高水平的學術集刊，某些集刊有幸進入“核心期刊”等指標體系，境況有所改善，但無法從整體上改變集刊遭受“制度性歧視”的基本格局。正如楊玉

聖先生指出，集刊的專業學術價值和文化品位，就總體而言，要遠遠超過有正式刊號的學術刊物。就因為是以書號出版，故按圖書發行，又因其專業性強，故流布不廣。因為是圖書形式，故其所載論文亦不被相關論文檢索數據庫所檢索，集刊處在一種被現行學術評價機制（尤其是在高校）“不承認”的荒誕、尷尬的境地。^④這種境況對集刊發展相當不利，集刊無法獲得一般期刊所擁有的常規條件和發展空間，很難與之在公平條件下競爭。這對集刊的稿源制約非常致命，不難理解，一般作者不會把集刊作為第一投稿對象，除非有特別資源，稿費等方面的補償特別豐厚。

在當下學術環境，集刊要獲得滿意的稿源，顯然不是輕而易舉。以國內海洋史研究為例，作為新興學科，目前不斷升溫，但專業工作者實際上並不多，大多是其他學科專家（如中外關係史、社會經濟史以及歷史地理等）兼顧海洋史，散佈於高校或研究機構。所以集刊除了密切關注相關學科動態、掌握相關專家信息外，還必須另闢蹊徑，另覓他途，在一般期刊覆蓋的空間之外尋找新的稿源。筆者以為，集刊的主事者應該發揮比一般刊物編輯“高出一籌”的專業高度，高處著眼，特別關注國內外的高端作者，通過人脈關係、業緣關係與網絡資源，凝聚起學科背景不同而關注面相同的高端作者群與網絡圈；依靠高水平作者，獲得可靠的高水平稿源。只要稿源質量有了可靠保障，大體上就可以破解辦刊的最要緊瓶頸，解決其他問題相對比較容易。

所謂高端作者，依筆者之見，大概屬於這麼些學者：在國內，他們總體上是居於專業金字塔上層的一群人，有著高遠的學術境界。他們的學術研究已經脫離或者可以脫離現有科研管理體制上的束縛，可以不參加這樣那樣的類似舊時生產隊“工分制”的業績考核，或者對體制因素可以忽略不計。他們注重學術效益，只關心成果是否“發得其所”，而不在乎是否“核心期刊”、“權威期刊”，因而樂意將成果投給專業的、有影響的集刊。具體可分為兩類：一是專業上卓有建樹的前輩，他們已經退休或者接近退休，但寶刀不老，屬於學術常青樹，“工分”對他們不起作用，或基本不起作用；二是年富力強的專業骨幹，他們成果豐碩，創造力旺盛，對“工分”也不太在乎。在境外（包括台港澳），高水平專家可作為另一類高端作者。他們完全可以不理會國內科研管理、科研考核，也無須乎計較刊物是否“核心”、“權威”，只認刊物是否符合國際規範？是否有水平？只要合適，他們會很樂意以稿相投。

面對高端作者，要求集刊主事者具備良好的學術修養、專業造詣和人脈關係，以其對學術的虔誠和熱忱，人格魅力，去感動“上帝”，乃可奏效，獲得高端作者飽含學術與真情的“人情稿”——當然這裡的“人情稿”不是指通常令國內期刊老總、編輯們厭煩不已的“人情稿”。本刊從創辦之初，即確定主打高端作者的定位，獲得不少當世學界耆宿俊傑的回應，如中國學者（含台港澳學者）楊國楨、張椿年、蔡鴻生、陳春聲、錢江、金國平、鄭德華、湯開建、王頌、王振忠、陳國棟、鄭永常、湯熙勇、劉序楓、張珣，法國學者Claudine Salmon（蘇爾夢），德國學者Roderich Ptak（普塔克）、Ralph Kauz（廉亞明），澳洲學者Judith Cameron、李塔娜（Li Tana），美國學者Robert Antony（安樂博）、Paul A. Van Dyke（范岱克），比利時學者Angela Schottenhammer（蕭婷），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松浦章、中島樂章，新加坡學者Geoffrey Wade（韋傑夫），印度學者S. Jeyaseela Stephen等等，這些高端作者的“人情稿”成為本刊舉足輕重的寶貴稿源。

相對於一般刊物，集刊有其“先天不足”，然而能否改變難有作為的天然宿命呢？關鍵看如何揚長避短，以己之長，克彼之短，集刊與一般期刊之優劣形勢，完全可以倒轉過來。筆者認為，集刊立足專業根本、高端定位非常重要。定位高端，高位發展，其發展創新空間就越廣闊；

而且高端定位的純學術標準可以使集刊排除各類非學術因素干擾，令某些動機不純、企圖牟取非學術利益者望而卻步，知難而退，從而使集刊保持較清純的學術品位和較高的學術水平。前文提到的一些民國名刊，時下在各個學術領域擁有影響力的專業名刊，走的都是高端定位，集國內外專業同好之所長，形成自己獨特優勢，立於不敗之地。

（一）依託學科優長，研編結合，使專業優勢轉化為集刊優勢

筆者所在研究機構素有海洋史研究的傳統。上世紀80年代以來，廣東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屬下廣東地方史、中國社會經濟史、港澳史三個研究室，在研究領域與研究方向上均側重於區域體系，同時也都具有濃厚的海洋意識與“涉海”取向，在海洋社會經濟史研究上頗多建樹，例如葉顯恩、蔣祖緣、鄧開頌、劉澤生教授等對明清珠三角社會經濟史、廣東地方史研究、港澳史的研究，在國內外享有聲譽。近年筆者在明清海洋貿易、中外關係、海上絲綢之路、海外華人等研究上也取得一定進展。上述研究均成為廣東有特色的優長學科，為海洋史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礎。

中心成立後，在傳統優長學科積澱基礎上，致力於建構有區域特色的海洋史學科體系，近年承擔了國家“十二五”期間（2011～2015年）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南海史”，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子項目“南海交通歷史地理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7～18世紀華人南渡與越南社會”、“明代廣東海防體制轉變研究”，國家海洋局南海分局課題“國內外斷續線畫法沿革與法理依據研究”、“‘九段線’管轄權法理證據研究”、“民國時期中、英、法、越南海地圖圖例比較與國際法研究”，廣東省社科規劃基金項目“晚清海權觀演進研究”、“近代廣東沿海地區的民間管治”等，取得可喜成就，為近年廣東學術的一個亮點，在全國也有較大的影響。

圍繞中心科研重點與學科方向，中心把專業研究與本刊編輯工作銜接起來，研編結合，彼此為用，使專業優長轉化為集刊的優勢。科研人員在編輯過程中獲得多方面的鍛煉，獲取大量專業知識和前沿動態，拓展了視野，提升了科研能力；而科研人員在辦刊過程中努力貫注中心的發展理念與學科方向，發揮好集刊所依託的團隊優勢、專業優勢及其集群效應，煥發出一般期刊難以企及的專業化、規模化競爭力和影響力。

迄今為止，本刊已經出版4集，共發表專題論文49篇，專題筆談3篇，書評、學術綜述13篇，第5、6輯正在編輯之中，內容涵蓋亞太海洋貿易、海上交通、海洋政策、海防海盜、華僑華人、海洋信仰等等問題，主體內容與中心工作大體一致，很好地達致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優勢互補的效果。

（二）關注學科前沿，在優長領域做特做強

根據學科發展需要，本刊追蹤學術潮流與熱點，注重在專業、特色上下功夫，以大篇幅的專題策劃，向海內外同行及讀者提供新成果。每一集均發表若干組專論文章，構成若干個專題板塊和專題組團；這些專題板塊每集或隔集推出，保持穩定性和延續性。目前，諸如南海貿易、東亞海盜、宋明海外遺民、北部灣海域歷史、越南華人等專題，已成為本刊核心性主題板塊。

對有新意有創見的好稿原則上不限篇幅，本刊發表的專題論文大多在二、三萬字左右，超過5萬字的長文有3篇之多。此外，本刊對論文所附表格、圖錄、照片，一般也不加限制。圖表往往是作者多年爬梳史料、田野調研所積累的非文字史料，有其獨特的學術價值。例如筆者撰《鄭玖、鄭天賜與河仙政權（港口國）》所附照片、碑刻，是筆者多年來在越南河仙、中國北部灣、雷州半島等沿海奔波考察所得。蘇爾夢（Claudine Salmon）教授撰《從梵鐘銘文看中國與東南亞的貿易往來》、《碑銘所見南海諸國之明代遺民》等力作附錄大量梵鐘、會館、碑銘圖片、拓

片及統計表格，是她數十年來在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等國家田野考察所得，也有東南亞史名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教授等的貢獻。范岱克教授（Paul Van Dyke）撰*New Sea Routes to Canton in the 18th Century and the Decline of China's Control over Trade*所附17~18世紀廣州行商記錄、來華歐洲商船及南海航路海圖，是他多年從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美國、丹麥、瑞典和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澳門有關文獻、檔案資料，特別是荷蘭東印度公司、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中爬梳整理出來的。此類歷史數據、航海地圖、實物照片，本屬於難得的獨家史料或第一手材料，彌足珍貴。這些論文配以相關圖表，圖文並茂，文表結合，只會錦上添花，相得益彰。而且循著圖表所透露的信息和線索，讀者可以進一步深度解讀歷史，深化研究。

突顯集刊特色與水平，必然需要未雨綢繆，有計劃地做好策劃組織工作。一個比較令人滿意的例子，是本刊第二輯“亞洲海峽研究專題”。近年來，隨著海洋史研究的不斷拓展，諸如三角洲、灣區、港口、島嶼等海洋地理單元相繼進入學者的研究視野，成為一新的趨向。2010年，中心顧問、德國慕尼黑大學普塔克教授訪問本中心，並作亞洲海峽歷史研究的專題報告，從“海峽的視角”探究亞洲海峽區域獨特的自然、人文、歷史發展軌跡，尋求構建海峽作為人類文明交流的“海洋通道”的功能與作用的歷史解釋和理論模式。這是一個很新穎、很有啟迪的話題，這種“海峽本位”視角為海洋史研究開啟了一個通向幽深的門徑。因而我們與普塔克教授商議進一步合作研究，分頭邀請學者撰寫專題文章，在本刊開闢“海峽歷史研究”的專題板塊。一年後我們收到來自德國、葡萄牙、國內四位學者撰寫的專題論文，深度探索亞洲海峽的歷史與功能，普塔克教授專門寫了一篇“導言”，一併在本刊第2輯發表。該專題受到國內外同行的好評，影響很大。普塔克教授講座的英文版發表在*Crossroads -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Exchange Relations in the East Asian World* (2010)。《中國社會科學報》專題推介本刊第2輯，刊發了普塔克教授的“導論”。“中國經濟史論壇”等知名專業網站全文轉發該專輯多篇文章。2011年9月，“亞洲海峽：歷史與功能”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德國波恩大學舉行，來自德國、比利時、日本、中國、新加坡、英國、法國、葡萄牙、伊朗、印度的20多位學者出席了會議，宣讀論文16篇，在德國出版的國際學術刊物*Journal of Asian History*（《亞洲歷史雜誌》）2012年第2期（總第46期）以專輯形式發表了其中5篇文章，涉及馬六甲海峽、新加坡海峽、瓊州海峽、台灣海峽和傳統的從台灣航行到呂宋的狹長通道，還包括菲律賓群島內中心部分的眾多通道。

從中國粵西到越南北部的北部灣海域及沿海地區，秦漢以降長期處在中原王朝直接管轄之下，深受中華文化浸潤，經濟社會聯繫密切，具有別致的海洋氣息，以致於有西方學者將北部灣海域稱為“小地中海”。2008年3月，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與廣西社會科學院聯合舉辦了“小地中海：北部灣歷史與未來”（“A Small Mediterranean Sea”: Gulf of Tongking through History）國際學術研討會，隨後出版了*The Tongking Gulf through History*（2011）。2011年，本刊在中心顧問、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李塔娜教授、考古學家裘蒂絲·卡梅倫（Judith Cameron）教授、德國學者碧姬·博雷爾（Brigitte Borell）博士、中國學者郭聲波、馮孟欽教授等支持下，組織了一組專題論文，刊發在本刊第4輯，從歷史學、考古學、歷史地理學等多個視角探討史前至唐代交廣地區社會生活及其經濟聯繫、行政管轄等問題，反映了這一區域早期歷史的海洋特色。北部灣海域史關係到中越關係、南中國海海域史及其未來，仍將會受到國際學界重視，本刊第5輯將刊發另外一組由7篇相關論文組成的專題板塊。

中心與本刊以海洋史學為本位，注重理論建構與方法創新，提倡多學科交叉與多元視野，第

1輯即開闢“專題筆談”專欄，刊發學界對海洋史學科建構、學術創新的理論思考，成為有特色的欄目。普塔克教授《亞洲海峽的地理、功能和類型》、李紅岩教授《“海洋史學”淺議》等視角新穎，眼光獨到，頗受學界關注。2012年底，本刊有幸邀約到前輩大家楊國楨教授、張椿年教授、蔡鴻生教授等撰寫宏文，為海洋史學研究開示門徑，指點幽津，真知灼見，將在第5輯“專題筆談”刊出。

（三）依靠中心對外交流網絡，加強對外學術合作

學術乃天下之公器。海洋史研究空間如同浩瀚海洋那般廣闊，因而海洋史研究一定要加強與海內外學者的聯繫與交流，推動有關領域的進步。2009年，中心成立時，聘請了國內外19位知名專家為學術顧問，其中5位來自德國、澳大利亞、日本、荷蘭。他們在中心與集刊工作中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通過他們的人脈關係，中心、本刊與國內外同行建立起密切的聯繫，獲得多方面的友情支持，功不可沒。

本刊使用中英兩種文字，旨在將集刊辦成國際同道交流合作、共同耕耘的開放型學術園地。本刊每一集均有境外學者的文章，1~4輯53位作者中，中國內地作者27人，占總數的51%；台港澳地區作者9人，占總數的17%；國外作者17人，占作者總數32%，分別來自德國、澳大利亞、日本、新加坡、越南、印度、美國、葡萄牙、比利時。國內、境外作者比例幾乎各占一半，體現了本刊作者在結構上的國際化特點。本刊1~4輯共刊發66篇文章，其中中文文章47篇，中譯外文（英、法）文章13篇，英文文章6篇。

中心定期舉辦“史學前沿論壇”、“海洋廣東論壇”，加強與國內外相關機構、學者的交流合作，與德國*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Monumenta Serica*（《華裔學志》），法國*Archipel*（《群島》），比利時*Crossroads*，澳大利亞*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Studies*（《南方華裔研究雜誌》）等國際知名學術刊物建立起聯繫。

中心與境內外大學、研究機構合作，成功舉辦多次國際學術會議，為本刊開拓另一可靠稿源。例如2011年7月，中心聯合澳門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德國慕尼黑大學漢學研究所、日本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舉辦了“大航海時代的澳門、廣東與東南亞”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自德國、日本、美國、葡萄牙以及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台灣的40多位學者出席會議，收到論文37篇，其中17篇在第3輯刊出。2012年12月，中心再次聯合上述機構，舉辦“澳門、廣東與亞太海域交流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國內外學者近50人參加研討，其中10餘篇論文經專家評審，將在本刊第6輯出版。

三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資深研究員、《絲瓷之路》主編李錦繡教授認為，現在專業刊物並不罕見，但有主旨、有學術理念的刊物不多，很多是同類的論文集而已。《海洋史研究》強調於海洋本位和國際視野，致力於構建具有區域特色的海洋史研究體系，難能可貴，在現今學術刊物中，屬鳳毛麟角，成果和影響，都不可限量。

本刊以海洋史學專業為根本，力圖通過高端定位，走特色發展與國際化路徑，中長期目標是將本刊經營成有區域特色、有影響力的國際性學術交流平臺，為海洋史學建設貢獻微薄之力。2010年，本刊第1輯甫一面世，就受到學界關注。張麗、任靈蘭教授《近五年來的中國海洋史研究》指出，廣東海洋史研究中心與《海洋史研究》的創立，“或許可以成為中國海洋史研究的

新起點”。^⑤2011年，劉蘇里先生在《2011年度思想學術文化類圖書印象——民國熱，黨史熱，啟蒙也熱》將本刊列為國內年度熱門學術思想類圖書^⑥，相關評論在“萬聖書園”、“騰訊”、“南方週末”等傳媒流傳。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世界史研究網”、“中國經濟史研究網”以及“中國國家博物館網”等均介紹過本刊，國外有網站將本刊譽為近兩三年崛起的海交史/海洋史研究雜誌的“新秀”^⑦。

今年初，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資料中心《歷史學文摘》第1期專門設立了“特別推薦——海洋史研究”專欄，轉載本刊2012年出版的第3、4輯的5篇論文。最近，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計劃將一批國內知名集刊推薦至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英文版，擴大國際影響，本刊也在推薦之列。

本刊創刊時間不長，但開局令人滿意。作為海洋史專業研究者、非專業的集刊主編，筆者深深體會到要辦好一份優秀集刊並可持續發展，殊非易事。本刊同樣面臨其他集刊所面對的種種困難，例如集刊“身份”尷尬，至今名不正言不順；在學術科研考核、成果評獎、職稱評定中，經常受到“不公平”待遇；在經費、人力上，缺乏長期、穩定的制度性支持，等等。解決專業集刊當前的困境，筆者以為，應該注意如下幾方面：

一是為學術集刊的尷尬身份正名，給予集刊合適的發展條件與空間。當世主持學術期刊事務、科研管理之衮衮諸公，皆學界中人，固深明學術大義，當與時俱進，優化學術環境與管理制度，為學術創新、整體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當下學術集刊面臨的困境，要解決並不複雜，只要像對待一般期刊那樣對待學術集刊，同等條件，同等要求，一視同仁，不厚此薄彼即可。畢竟集刊的主事者大抵都是有覺悟的學界精英，專家辦刊，專業理念，專業水平，大體上是有保障的。期刊集刊，共同繁榮，多一有份量的集刊，就有可能多一個學術增長點和創新點，豈非學界值得成全、值得慶倖之大好事？

二是給予合乎規範的優秀集刊適當的支持（例如納入國家“名刊工程”資助計劃，推動名刊外譯出版計劃），使優秀集刊在上檔次、國際化等方面獲得更大的上升空間，形成在國際上具有前沿水平和規模效應的名優集刊群。據楊玉聖先生統計，2005年中國的學術集刊達到500種左右；而謝壽光先生估計，全國每年出版的集刊，應該能在學術圖書裡占1/4左右，可見集刊數量龐大。不可否認，集刊與眾多學術刊物一樣，存在諸多問題，良莠不齊，當然亦有水平泛泛甚至不入流者，然而就總體而言，相當部分集刊專業學術價值和文化品位遠遠超過有正式刊號的學術刊物。^⑧那些由著名學者主掌的、有強大研究團隊支撐的知名集刊，具有較強學術話語權和影響力，對中國學術走向世界，無疑是最精銳、最有水平的主力軍之一。所以，在支持各類學術刊物發展的時候，不應忽視這批特種優秀集刊。

三是集刊行內要形成共識，建立適應集刊發展的管理、評估體系。毫無疑問，現有的集刊存在諸多缺陷，體例不規範，出版週期比較隨意，水平參差不齊，從整體層面上缺乏一套完善的稿件徵集機制、評審機制、准入機制，等等，所以集刊需要自警自糾，在集刊編輯出版的科學化、規範化、制度化上向優秀期刊看齊。實施“進入—退出”機制，優勝劣汰，確保集刊在規範軌道上向專業高端發展。2012年12月，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廣東社會科學院主辦的全國“首屆人文社會科學集刊年會”召開，中心有幸承辦了這次會議。全國地方社會科學院、高校以及科研院所的百余名專家學者齊聚廣州，從學術研創和出版規範等角度，對學術集刊的發展進行了全方位、深層次的探討與交流，在集刊的編撰、出版、評價、推廣等方面形成“廣州共識”，可視為集刊界集體有意識地“華麗轉身”，推進自身規範化發展，致力於推動中國學術園地的建設和學術繁榮

的標誌性事件。可以相信，集刊的路子將會越走越寬廣。

四是將集刊納入專業機構長期發展規劃中，使集刊獲得可持續發展的可靠條件與保障；發揮集刊優勢，建立並鞏固專業集刊特有的、其他學術期刊中不可取代的優勢地位。國際上有些成功的集刊可供參考借鑒，例如國際知名的漢學刊物《華裔學志》（*Monumenta Serica*），1935年創辦於北平輔仁大學，1949年後遷至日本名古屋南山大學（Nanzan, Nagoya）、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1972年遷至德國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聖奧古斯丁市（Sankt Augustin），目前已發展成為既是一份漢學刊物，又是一間出版機構，還是一家藏書豐富、獨具特色的漢學圖書館，國際知名的漢學研究機構“華裔學志研究院”（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華裔學志”鼓勵東西方學界的互動與中國學者的參與，對傳教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尤其關注，出版《華裔學志》雜誌、“華裔學志叢書”（*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始於1937年）和“華裔選集”（*Collectanea Serica*，始於1964年）。作為一家有近80年歷史的漢學雜誌，在歐洲與世界漢學界中的地位與影響，只有《通報》（*Toung Pao*）可以相媲美。這種由單一功能的學術集刊向多功能綜合性學術機構發展的趨勢，具有更強大的學術生命力和影響力，或許是中國有實力、有理想的集刊及相關機構發展的一個可能選項。

錢鍾書先生說：“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⑧筆者認為，無論集刊還是一般刊物，其共同目標都指向發表高水平學術成果，追求高品位學術境界。有所不同的是，一般刊物以綜合見長，集刊則以專精取勝。集刊不懼“曲高和寡”，最忌平庸趨俗；集刊人應該有“素心人”情懷，在專業高端專心致志，凝聚志同道合的研究團隊與學者共同體之智慧，向學術界推介純粹精湛的學術成果，為學術創新、學科建設、學術流派發展多作貢獻。《海洋史研究》堅守專業根本，高端定位，特色發展，國際視野，不僅是中心同人耕耘的田園，也是向海內外同行開放、用心靈共建的精神家園。筆者相信，這也是學術集刊追求的基本目標和發展取向。

①許光秋：《國外海洋史研究狀況》，2012年3月1日在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史學前沿論壇”的演講。

②孟凡東：《亞洲區域模式論——濱下武志教授的“亞洲史重構”研究》，天津：《歷史教學問題》，2005年第5期。

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6月8日。

④楊玉聖：《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集刊名錄》，“楊玉聖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yangyusheng>

⑤北京：《世界歷史》，2011年第1期。

⑥北京：《中國青年報》，2011年12月20日。

⑦馬光：《〈海洋史研究〉第1~4輯簡介與目錄》，比利時根特，<http://www.maguang.net/>

⑧參見楊玉聖：《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集刊名錄》，“楊玉聖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yangyusheng>；謝壽光：《首屆人文社會科學集刊年會開幕詞》，“中國集刊網”，2013年4月7日。

⑨羅厚輯注：《錢鍾書書札書抄（64，與鄭朝宗）》，錢鍾書研究編輯委員會編：《錢鍾書研究》，第三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2年，第314頁。

作者簡介：李慶新，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廣東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海洋史研究》主編，研究員，博士。廣州 510610

[責任編輯 劉澤生]